

History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历史不应忘记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著
沈苏儒 贾宗谊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不应忘记/爱泼斯坦 (Epstein, I.) 著;沈苏儒等译.-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5. 4

ISBN 7-5085-0693-6

I. 历...

II. ①爱...②沈...

III. 爱泼斯坦, I. -回忆录

IV. K825. 42. 65

历史不应忘记

著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译者:沈苏儒 贾宗谊等

责任编辑:魏秀堂 饶凤歧

编辑助理:胡艳丽

装帧设计:田林

设计制作:北京原色印象文化艺术中心

出版发行:五洲传播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6号 邮编:100038)

承印者: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965cm 1/16

印张:14.5

字数:150千

版次:2005年4月第1版

印次: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书号:ISBN 7-5085-0693-6/K·634

定价:3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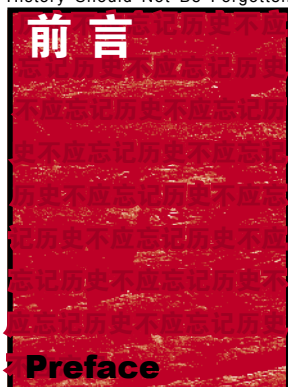


History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5	前言	
11	第一章	卢沟桥的枪声
25	第二章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35	第三章	从南京撤退
45	第四章	武汉的统一战线
53	第五章	台儿庄的胜利
63	第六章	广州的陷落
77	第七章	抗战中的宋庆龄
89	第八章	华北人民的抵抗
113	第九章	敌后的新四军
131	第十章	从重庆到延安
141	第十一章	延安见闻
151	第十二章	在敌后的一次旅程
159	第十三章	发生在敌后的故事
175	第十四章	指挥敌后斗争的中共领导人
193	第十五章	举国抗战
211	第十六章	抗战的最后阶段
225	后记	

History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2005年，在中国，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全世界范围，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联合作战共同击败法西斯60周年。为了唤起人们永远牢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在我90岁诞辰到来之际，谨以我从1937年到1945年间在中国战场上写的通讯报道和回忆为基础，重新编写成这本书，作为我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点贡献。

我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20年前生活在哈尔滨。在那里，我接受了一生中惟一的一点俄语教育。1920年，我们家迁往天津，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天津度过的。在天津，我生活了18年——受到了当时所能受到的学校教育，人也长大了。在哈尔滨，我们的世界是俄国式的，在天津，则主要是英美式的。因此英语成了我最擅长的、最便于表达的语言。这是因为我念书的学校里没有中文课程。尽管我在年轻时没有人教我中文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半殖民地环境的多种影响，但我父母的进步传统对这些影响起了抵制的作用，对我的世界观起了引导的作用，使我没有为这些影响所湮没。同时，我同中国的现实日益接近。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国的东北，使我受到震撼，这时我已16岁半并已开始工作。

从记事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长大后果然如愿以偿。1931年在《京

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3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识，很快便开始为斯诺夫妇创办的《民主》月刊写稿，接着又成了这家刊物的编委会成员。那时我刚满22岁。1937年7月底，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后来改称北京），《民主》月刊也随即被扼杀。我也在那一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

我是在中国长大的，我的记者生涯是从中国开始的。当了记者后，我自己的兴趣便逐渐地，而不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与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惟一主题。命运注定我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就在我初任记者不久的1935年冬天，面临严重的民族存亡危机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我目睹了它的发展过程，还通过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了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情况，得到了一些解放区的消息。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战歌，响彻中国大地，也震撼了我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的心。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那时候我的家在天津，我的父母在那里已经住了20多年，他们不愿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要移居美国。我何去何从呢？我决定留在中国。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但那是身不由己，而这次我决定留下来，却是心甘情愿的。我深信中国最后会赢得这场战争，我想用记者之笔记录下这个过程。在天津附近的港口塘沽的轮船上，我看到许多满载日本兵的登陆舰正在靠岸。当时我想：“现在你们翘着尾巴来了，但我要留下来看你们夹着尾巴回去。”

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那时决定投身于中国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抗日斗争，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我参加反对妄图把世界拉回黑暗时代的法西斯的斗争的决心。因为有这个决心，即使那时我不在中国，而是在欧洲或别的什么地方，同样的动机和决心也会使我参加那里的反法西斯斗争。事实是，当时我住在中国。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支持和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就是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实际贡献。而且我坚信，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在经历的一个世纪的屈辱的失败之后的奋起抗争，是决不会再失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多了

这一股力量，胜利将更有把握。

我见证了中国这场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全过程。在北平，我听到了卢沟桥的枪声——1937的“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但是不久北平就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也相继陷落。在这些大城市的争夺过程中，我无一例外地看到了日本兵惨绝人寰的暴行，到现在想起来还令我不寒而栗，特别是他们在南京实施的大屠杀。在战争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战争开始之后，我先是告别了北平、天津，来到了南京。接着又到了武汉。在武汉，我看到过统一战线辉煌的日子——它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希望，甚至国民党中的主张抗日的人士也感受到了这种希望。在南京和武汉，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是共产党战时与国民党打交道的全权机构。（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对中国现代史了解甚少的人，可能一下子还不能知道这些党派和军队是怎么回事，这不要紧，只要耐下心来继续下去，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答案。）

在中国各大城市，我看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反日情绪和各种形式的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尽管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我始终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他们。而在战场上，从抗日将士的英勇抵抗中，我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1938年我在山东省的台儿庄战役中就看到了中国士兵英勇抵抗的壮举。

同一年，我还开始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知道了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比较具体的作战消息。我还开始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廖承志的指导下为中共润色英文文献。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用他们的行动和思想让我认识到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上的真正胜利，就不可能有新中国。

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中国战争时期的政治中心不断内迁，最后到了大西南的重庆。在重庆的日子里，我看到了国民党的更加腐败，它的抗日力量这时已变得非常薄弱。我记得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曾对我哀叹：“我经常怀念在武汉的日子——那真是天堂！”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大后方掀起了空前的民主运动。一位美国外交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与其领导人蒋介石已经到了过去10年来最软弱无力的

地步，正在失去中国民众的支持。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事实上有两个战场，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成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陕北小城延安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那里领导和指挥敌后的抗日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延安成了所有卓有远见的中国爱国人士心目中的北极星。这里是一座巨大的熔炉，整个国家的未来领导人在这里受到锻炼和教育。

1944年5月至9月，包括我在内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突破国民党当局五年多的新闻封锁，进入延安。参观团包括六名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报人及工作人员。我那时是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社及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在那次采访当中，尽管国民党精心安排了种种限制，但记者团的采访还是实现了一次突破。它使全世界充分了解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国民党试图在记者团抵达目的地之前，以其反共宣传的洪流湮没访问者们的设想，结果却漏洞百出，由于做得太过头和手法拙劣，反而更加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怀疑。对世界舆论来说，这是一次发现，一种重新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这种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也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事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最为关键的是，记者们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人们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局面。相比之下，重庆则完全不同，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停滞不前，腐败不堪，消沉黑暗。结果，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全部图谋彻底失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同时，我们的延安之行也预示了这些地区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前景。

在此期间，我两次采访了毛泽东，一次是集体采访，一次是单独采访。毛主席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渊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采访的笔记本。在离开延安的头一天，毛主席还亲自到住处看望我和其他记者，并向每人赠送了一张他亲笔签名的画像。现

在，这张画像还挂在我家客厅的墙上。延安之行对我一生走的道路影响重大，让我终生难忘。当年采访的见闻，也一并收入到这本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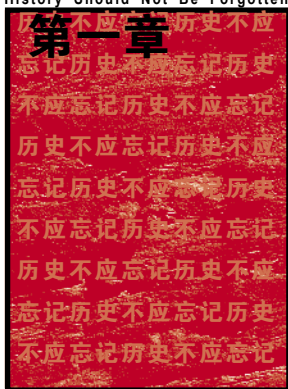
当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外国记者。中国人民的斗争使我的生命有了目标、意义和希望。说到此行对我个人的影响，国民党派来当记者团团长的谢保樵，一个专挑毛病的人，曾怒气冲冲但却真实地报告说：“艾培（我的简称和爱称）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此行让我确信无疑的是，这个边区遭到包围和封锁，但并不是一个可怜的地区，而像一个小型的国家，是许多地区的后方；这里的人民充分相信，他们就是中国，就是中国的未来。所以我把当时对延安的印象概括为“新中国的胚胎”。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中国还有许多外国朋友与我有相同的感受和行动。

首先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1936年，即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年，他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采访。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革命业绩。接踵而来的，是他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威尔士），她写了著名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后来他们又都多次访问中国。在那场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战争期间，先后曾有许多外国记者沿着斯诺所走过的道路，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深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解放区进行采访。他们在这里同解放区军民亲切相处，目睹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封锁，创造出人间奇迹的情景。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也和斯诺一样，精心观察、研究中国，写了许多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情况的著作。在这里，他们不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旁观者，而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热情地讴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严正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些那时来华的外国记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到过解放区，但是也常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努力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资料，以便对外进行介绍。尽管他们具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但都毫不例外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发表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著述。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和斯诺一样，为促进世界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可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而我是幸运者之一。在纪念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当年在中国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也想起了与我一起参加和对外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国际友人。谨以此书献给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士，也纪念为这场正义战争的胜利而死难的人们，包括那些先我而去的朋友们。

History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卢沟桥的枪声

1937年7月7日夜，我在北平听到了卢沟桥的枪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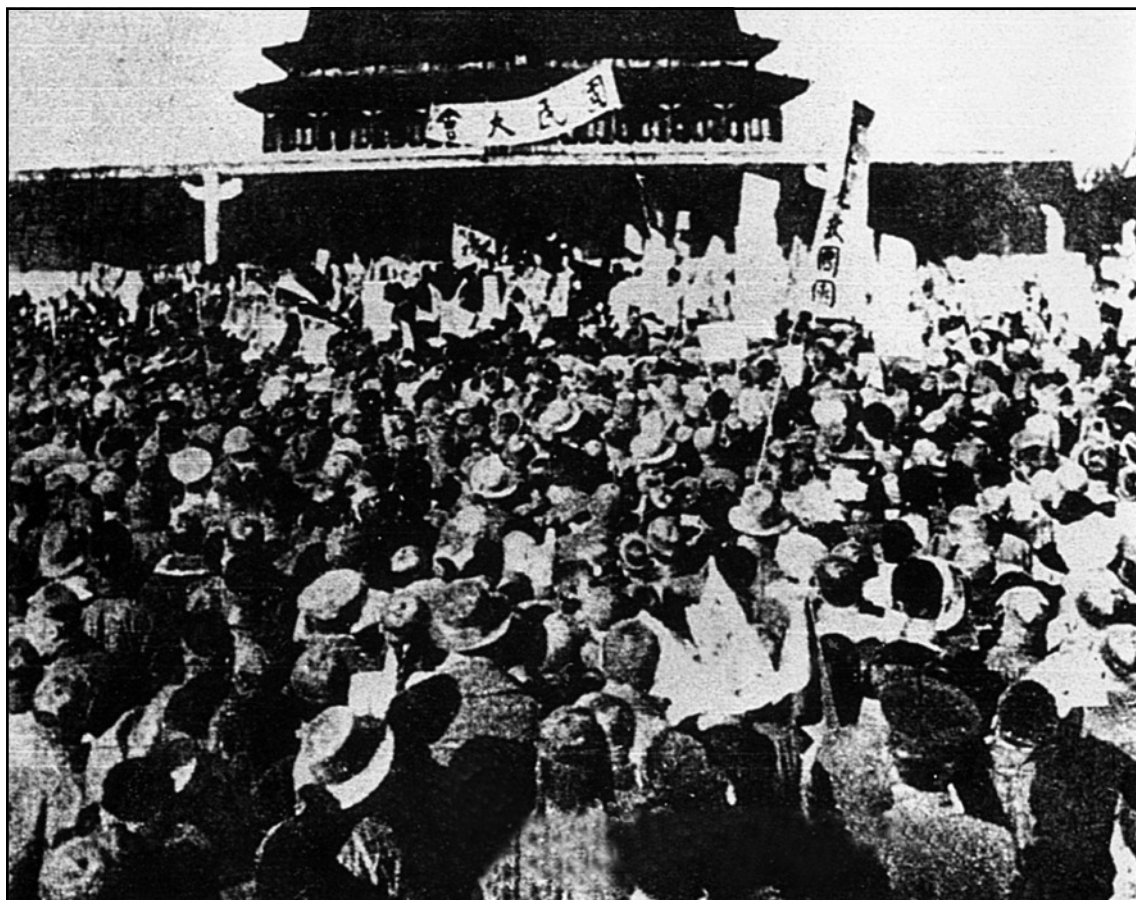
位于宛平城下的卢沟桥，距北平10多公里，扼守着北京西南的交通要道，千百年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这一天之前，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华北的热河、察哈尔省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北平和天津事实上已成了国防前线。卢沟桥一旦失守，北平即成孤城。这一天下午，日军某部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23时许突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随即炮轰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向附近地区发起猛烈进攻。守军奋起反抗，表示要誓死保卫卢沟桥。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面对日本强敌的侵略，中国现代史上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站起来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过去，说这样的话，一直是件危险的事情。

早在18世纪40年代，中国首次败于外国列强，被迫割让香港和一次次划界租地，并对外国开放沿海通商口岸；那时，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就曾对清帝国政府说过这样的话。结果是10年战争，2000万人丧生，而这块土地依然掌握在清朝官吏的手中。



1900年，中国相继把台湾让与日本、把青岛让与德国、把旅顺口让与俄国、把威海卫让与英国后，奋起反抗的义和团又说过这样的话。义和团走错了路，因被出卖而失败。由于当时统治者的背信弃义和懦弱，中国人民不断付出代价。

1919年12月，北京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巴黎和约、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

在随后的10年中，留学西方和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说过这句话。他们宣传鼓动、奋起斗争、受苦受难。此时，中国成立了一个党，后来叫作国民党。1911年，国民党在其他派别的帮助下，推翻了清王朝，为中国历史上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在日本军队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后，这个王朝的末代皇帝和大臣们组成了“满洲国”的傀儡王室。）

当民国总统于1915年签署拱手让日本实际上控制全中国的“二十一

条”卖国条款时，起而抗争的中国西南地区说过这句话。一年之内，总统袁世凯妄想称帝，但他受到致命打击，旋即一命呜呼。

1919年，学生们第一次走上街头，喊出这句话。作为理想主义的果实和自决权的捍卫者的凡尔赛条约，却把以前德国人从中国夺去的山东省交给了日本。被日本收买的中国政府予以默认了。（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后，这个政府的一些阁员成了日本的北平伪政权的“部长”。）

在北平的街道上，学生们死于警察的枪弹。当时，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劳工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在文学方面，青年作家反对过去那种枯燥无味的文言文，破天荒第一次用人民大众的日常语言进行写作。只要认识几千字，任何人都可以读书，怎么说，就怎么写，再也不怕被人讥笑为不懂古文的大老粗了。只要大声读出来，任何人都能听懂一本书或一份报纸了。

宛平城守军闻日军侵犯，紧急出城赴战。

国际力量迫使日本放弃了一部分它利用西方列强在欧洲火并之机从



中国夺取的租借权。在此期间，华北对峙的军阀们明争暗斗，要决定究竟是日本还是英国可以首先取得中国的资源。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人民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但它们在军阀统治的区域内都是非法的。

国民党占据了华南的广州，它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个由工业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旨在打破外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摧毁使现代工业难以发展的封建性土地占有制，以及打倒维护封建制度和充当外国阴谋工具的北洋军阀，从而统一全国。

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共产党，那时候的近期目标和国民党是相同的。和国民党一样，他们也要粉碎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发展工业和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摧毁封建制度和封建军阀统治。

国民党领导着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共产党，虽然成立的时间要晚一些，却显示出领导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能力。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父孙中山认识到：只有这些阶级和两党共同采取行动，才能实现两党的目标。1923年，两党结成了联盟。他们共同平息了广州叛乱。这次叛乱是由广东的一个封建军阀和英国汇丰银行的大买办领导的，他们支持叛乱分子作为反共的堡垒。

“这块土地是我们！”学生说。虽然在上海和广州他们死于英国的枪弹之下，但是，全国范围开展起来的运动继续说这句话。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工人说。他们发动的总罢工使香港陷于瘫痪，使英国在中国沿海港口的贸易陷于停顿。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农民说。他们打碎了农村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权力，扛起枪，参加革命军，去攻打北方军阀的堡垒。随着他们的挺进，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结构摇摇欲坠了。

1925年春天，孙中山逝世。

他死后两年，国共两党的联盟、各个集团的联合，受阻于中国当时所处的落后状态，终于破裂了。国民党不再支持工人和农民，转而同地主和买办阶级联合在一起了。老百姓再也不能说，土地是他们的了，因为土地被抵押出去了。共产党员要么死于屠刀下，要么退到偏远的山区，继续把被剥削的穷苦人组织起来。

接着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10年。由于南方军队的北伐并没有铲除封建统治，而是同它妥协，结果军阀之间的内战又打了起来。老

百姓继续起来反抗。当局调动了无数兵力来袭击共产党的根据地，因为根据地存在的本身被认为对民众的反抗起着鼓舞作用。

一直觊觎中国领土的日本人认为，当时的形势千载难逢，并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1931年，他们轻而易举地攫取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因为中国这时刚刚结束一场大内战，又开始对江西的红色根据地发动新的战役。当时的中国，由于内部的政治原因，同与东北接壤的另一个国家——苏联是疏远的。

从一开始，东北人民就拒绝当亡国奴。虽然主力军撤退了，但是，数以万计的士兵、数十万武装起来的农民和工人，以及许多将领们继续抵抗征服者。当长城以南的将军们仍然与人民为敌时，东北反抗侵略者的人们却团结起来了。同日本人合作的东北军阀们，在万众咒骂声中遗臭万年。而那些抗日的将领们则成了民族英雄，扬名四海。谁会忘记在嫩江神出鬼没、在东北的丛林中把日本人打得团团转的这些英雄呢？

南方没有往东北派军队。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因为中国和日本都参加了国联。国联对中国只是道义上声援而已。

东北义勇军单枪匹马地战斗着。

1932年8月，日本袭击了上海。谁能忘记固守上海两个月之久的第19路军的英雄事迹呢？

在这次战役中，江西的中华苏维埃政府表示愿意同任何抗日的部队共同对敌。

中日停战协定在上海签字了。政府认为日本人现在会满足于取得东北，乃重新采取“清内”的老政策。对“叛国”做出了新的解释：谁主张在清共以前就抗日，就是“叛国”。宣传收回东北，就是“叛国”。为义勇军募捐，就是“叛国”。

从上海撤出的第19路军的抗日英雄们被派到福建去打红军。他们打了一年。后来，他们造反了，成立了新政府。这次造反尚未站稳脚跟，就由于南京派飞机轰炸福州而失败了。这些飞机本来是用人民捐献的钱购买来打日本的。

日本人对华北进一步蚕食。继上海停战之后，塘沽也实现停战。华北的一部分地区变为“非军事区”。这就是说，中国军队不得进入，而日本军队则根据一项条约的规定可以沿铁路线任意行动。塘沽妥协使日本飞机

有权侦察这块领土，检查这个单方面的非军事化是否得到完全的实施。

1935年夏天，出现了另一个丧权辱国的事件。一纸何梅“协定”卡住了苟且偷安的中国的咽喉。根据这个“协定”，中央政府的军队被赶出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在中国执政的国民党的任何单位都不得在这两省活动，甚至也不得在北平、天津两大城市活动。反日的爱国人士将被起诉；将设立一个地区行政机关，聘用日本人为“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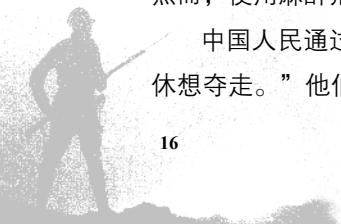
国民党的军队这时正在川藏边界一带追袭共产党人。他们是为完成长征、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经过那里的。

日本的官员和日本的报刊公开讨论着将来让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绥远等五省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据大英百科全书说，山西煤炭的储量足够全世界使用1000年。河北有丰富的煤炭、小麦和棉花。察哈尔和绥远拥有钢铁和毛皮。山东有煤炭、棉花和小麦。日本的理论家说，这些省份将同日本和“满州国”形成一个经济集团，提供原料，以便使日本帝国实现其征服世界的美梦。

但是，日本人的美梦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他们的蚕食行动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抵抗，而中国政府却从来不敢这么做。1935年12月9日和16日，数以千计的北平学生，不顾警察的卡宾枪和日本人扬言要使用机关枪的威胁，在这座古城的街头游行，高呼爱国抗日口号，这些口号后来成为民族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在1935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被认为是“叛国”。许多学生由于自己的勇敢行动而牺牲了生命。官方把日本视为“友邦”，所谓停止内战的说法成了异端邪说。无休止地袭击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内战，而是剿“匪”——这是官方的立场。

不过，北平的游行和由此而在全中国引起的抗议浪潮，使日本不敢立即推行其计划。如果枪杀这些学生，那将是危险的。（他们知道，1919年和1925年屠杀学生的结果，是激起民愤，使全国都行动起来。）“病人”突然发起烧来，日本外科医生不敢贸然对中国巨人的躯体作另一次手术，首先要使它退烧，让它冷静下来，这就需要更多的麻醉剂。然而，使用麻醉剂，已经为时太晚。

中国人民通过北平的学生对日本人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你们休想夺走。”他们对自己的政府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你们不能签



约让给他人。”

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于1935年6月签订的北平协定，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何梅协定”，是中央政府签署的最后一个妥协文件。

学生游行示威半年之后，中国的团结面临真正的考验。

广东和广西的军事领导人早就有夺取全国政权的野心。现在，他们准备进军南京，并且打着抗日的旗帜，以取得全国的支持。北平的学生运动曾使日本震惊不安。而这个新的事态发展，日本却不怎么担心。它坐山观虎斗，希望中国打内战。

它谨慎地、拐弯抹角地给新冒出来的南方叛军以安慰，尽管他们是在抗日的口号下行动的。只要不同派别的军队相互厮打，中国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军火和精心训练出来的一些正规师就会在内战中耗尽，他们喊什么口号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北京街头高呼“停止内战”口号的学生，并不像当局所指责的那样，是暗中攻击政府。他们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深刻信念：在日本的威胁面前，一切内部斗争都必须停止。不管口号如何，南方的造反行动毕竟没有酿成内战，因为广东人民完全拒绝给予支持。多年的割据局面，不战而结束，南方归附于中央政府。

那年夏天，完成了长征、最后到达陕北的红军部分部队开进了山西省，提出这样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要求建立一个抗日国防政府！”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日本人想要把他们的触角伸向中国西部的成都。他们派遣“调查员”去访问该市，准备在那里开设领事馆。他们一直坚持此事，尽管他们在那个地区并没有进行贸易，而且中央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在成都街头示威的群众把这些“调查员”打成肉饼。

秋天，日本人组织了蒙古雇佣军入侵绥远省。他们遇到的不是谈判、妥协和中国人的撤退，而是坚决抵抗。包括中央军在内的中国部队在百灵庙取得了胜利。举国振奋，群情激昂。绥远驻军都是些实实在在的职业兵，他们迷惑不解地说：“我们不怕日本人，但是对这些每天越来越多的慰问团，该怎么办？给人家吃什么？学生呀、工人呀、妇女呀，各行各业的人，手捧着礼品，都是从哪儿来的？”